

1979年春，時值文革結束不久，李洪林在《讀書》創刊號上發表了〈讀書無禁區〉，被視作上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黃金歲月的先聲。今天，斯人驟然離世，遇上北方的思想冷鋒襲來，禁區有增無減。我們在此悼念一個人，也悼念一個時代。

——編者

中國幽靈，台灣民主

陳芳明在〈台灣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二十一世紀》2016年4月號）一文分析了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的原因，並歸結為民主模式、中國因素、世代力量、公民運動、社會轉型、內閣分裂等，較為全面地展現了台灣政治地景的變化對政黨輪替的直接影響。然而，這些分析有時會流於既定立場的政治評論，缺乏應有的冷靜政治批判。

文中着重對國民黨親中政策的批評，忽略了對其背後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對民進黨與新生世代互動的暗示，也沒有對其可能產生的民粹主義傾向作批判。同時，「民主」的意義一開始便被完全窄化為選舉、選票，並將其作為一種道德政治符號，指涉「仍然停留在比戒嚴時期還落後」的中國大陸。

台灣的中國因素實際根植於台灣殖民、後殖民與解殖、內戰與冷戰等錯綜複雜的多重歷史，單純抽離出一個「中國」並對其進行簡單的否定，其實無法為台灣政治提供反身性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的思考。比如文中提及的中國「威脅」比較起華府和東京對蔡英文的「背書」、「支持」、「信任」，不僅暴露其「中國—台灣」二元對立框架的雙重標準，也暗示了台灣在解殖道路上的任重道遠。筆者其實更期待陳芳明展現出其中國想像之外的另一種批判，而非「台灣人民似乎又看見了希望」式的先知文學；或許把中國視為一種方法視角，多一些自剖式的反躬自省，特別是台灣在政治上的重新自我審視甚至自我否定，而不囿於政治上的政黨之見和中國想像。

林仲軒 澳門

2016.4.25

台灣民主之路與「自然獨」

陳芳明在〈台灣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二十一世紀》2016年4月號）中指出，2016年台灣經過全體公民參與的民主選舉，即將迎來政黨執政的再次轉換，值得肯定。1987年，識世界文明發展大趨勢的蔣經國決然在台灣推行民主體制轉換，此後經風沐雨，日漸成熟。此民主選舉體制雖非完美，但無疑勝於血腥內鬥不

斷、終日惶恐不安的君主專制或極權政體，故能發展迅速。

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實行民主體制，需要不斷完善、需要人民對此體制的參與和維護意識日漸增長；儘管在不成熟階段時常會出現借民主之名煽起民粹、激進族群主義的浪漫主義。近年來台灣常出現的煽動民粹、製造意識形態對抗、以非理性的主張訴諸對事理的辨析，以及濫用人權名義、公然為詐騙大陸人民血汗錢財但在台灣被釋放的犯罪嫌疑犯叫好的聲音，可謂顯例。

法源為中國一省的台灣民主體制之實行與完善，不但是中華文化之福音、儒家文化傳統社會向民主制社會轉型之實踐，也是促成大陸社會民主轉型的根本；筆者相信同種同文的絕大多數台灣人民應為此而自豪。大陸改革開放後，包括民進黨員在內的大批台灣民眾到大陸訪問參觀以及創辦企業，推動了兩岸雙方民間交流與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認為台灣出現「自然獨」，並將原因歸為大批大陸民眾訪台而其部分人的失禮舉止，以及因為大陸與台灣執政當局簽訂的服務貿易協議等，筆者覺得不妨將視野擴大些，並可參考一下柏

林圍牆倒塌前後西德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東德同胞態度及其後續發展；畢竟，那種挑動民粹造成的「寧可肚子扁，也要阿扁當選」的結果，即便從短期看，受傷的也是廣大民眾，損害的是政黨、政體之信用與社會的發展。

呂玉新
2016.5.9

真正代表勞動者的勞工組織如何可能？

當前中國大陸在「維穩」的剛性要求下，主流媒體集體失聲，但此起彼伏的罷工潮使得勞工問題成了轉型期中國社會的一個重大公共議題。

常凱的〈中國勞動關係集體化轉型中的兩種力量和兩種路徑〉（《二十一世紀》2016年4月號）一文提出：目前勞工運動存在着體制內由官方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工會運動和體制外勞動者自發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勞工運動，勞工運動中之所以出現這兩種力量和路徑，主要是由於勞動者和工會分離所造成；如果中國工會能夠有效地代表勞動者，將不會出現這一現象。因而，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在現有體制下，有效代表勞動者的勞工組織如何可能？

唯一合法的工會組織作為黨領導下的群體團體，接受黨的領導是其最基本的原則；防範「獨立」、「第二」工會的出現，是中國工會的頭等大事。但體制外的力量不僅是一種現實存在，只要勞工市場存在和進一步發展，這種力量不斷壯大也是個必然趨勢。這樣，對

此處理得當與否，將會是中國勞動關係規制中一個關鍵問題。實際上，隨着這些討論的深入，我們已經進入了勞工運動與憲政關係的重大議題之中。中國的勞工運動說到底就是社會整體爭取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的一部分。誠如作者所言，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有待於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包括工會體制的改革。

潘學方 台州
2016.5.3

新的共同體意識的「想像」

王柯的〈宗教與戰爭——1930年代日本「回教圈」話語的建構〉（《二十一世紀》2016年4月號）一文，有助於讀者理解1930年代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如何建構「回教圈」的論述來合理化其侵略活動。文章除了補充日本學界對1930年代日本與伊斯蘭之間關係的研究不足之外，還透過日本的檔案史料，多方呈現日本在沒有伊斯蘭信仰的歷史背景下，如何重新發現「東突厥斯坦的同胞民族」、籌辦「大回教圈展覽會」以及動員滿洲的穆斯林社群，藉此跨越中華民族國家高牆，建立一個新的共同體意識。

日本建構「回教圈」的嘗試最終失敗，但作者僅在結語提到日本建構「回教圈」難以跨越中日民族國家的高牆，卻未具體說明在中國的不同族群穆斯林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否其失敗原因之一？如該文提到日本軍方大力扶持塔塔爾人在滿洲的政治與宗教活動，期盼將整個滿洲的回教徒帶入以日本為中心的「回教圈」，但有關塔塔

爾人與中國穆斯林之間的具體互動關係卻難以得知。

另外，戰時中國穆斯林抵制日本的「回教圈」論述，是否為日本建構「回教圈」失敗的另一原因，也尚未從此文得知。事實上，抗戰時期，中國的穆斯林也建構自己的回教論述權與整合回教組織，配合國民政府抵制日本的影響力，西北穆斯林聚集區宣傳抗日的重要性，還派人到中東穆斯林國家宣傳日本侵華的暴行，希望得到穆斯林國家的支持。

整體來說，王文揭露了日本政府建構「回教圈」話語權並非是關懷中國的穆斯林群體，而是為了帝國的擴張。事實上，日本並非第一個建構「回教圈」話語權的國家，在今日的西方國家中也可以看到相似的建構模式。或許西方國家與日本建構「回教圈」的論述方式無法相提並論，但帝國對「他者」的「重新發現」與「想像」，以及建構一套符合其國家利益的論述，是值得令人省思的。

包修平 香港
2016.4.27

更正與致歉

4月號常凱：〈中國勞動關係集體化轉型中的兩種力量和兩種路徑〉一文（頁30）中，關鍵詞「中華全國總公會」應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此更正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編輯室
2016.6